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QING XIANTONGNIANJIAN HUXIANG
LIXUE QUNTI YANJIU

张晨怡 著

清咸同年间湖湘理学 群体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清咸同年間湖湘理學 群體研究

張晨怡 著

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咸同年间湖湘理学群体研究/张晨怡著,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6

ISBN 978-7-81108-357-6

I. 清… II. 张… III. 理学—群体—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B249.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9856 号

清咸同年间湖湘理学群体研究

作 者 张晨怡

责任编辑 黄修义

封面设计 赵秀琴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6.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357-6

定 价 1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央民族大学“十五”“211 工程”学术出版物编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 理

副主任委员:郭卫平

委 员:王锺翰 施正一 牟钟鉴 戴庆厦 杨圣敏
文日焕 刘永佶 李魁正 朱雄全 宋才发
冯金朝 邓小飞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区域文化传统与资源	(13)
第一节 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区域文化传统	(14)
第二节 区域文化传统如何转化为资源	(26)
第二章 湖湘理学士人的集结	(44)
第一节 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最初形成	(46)
一、曾国藩与二仙的结识	(47)
二、曾、左、胡的早年交往	(60)
三、第一次重大的政治行动	(69)
四、湖湘理学士人的最初集结	(75)
第二节 一个典型案例：以罗泽南为中心的子群体	(79)
一、罗泽南与同辈湖湘理学士人	(79)
二、罗泽南与罗门弟子	(87)
第三章 湖湘理学群体的学术特色	(96)
第一节 学术论辩与调和：湖湘理学群体守道的两种方式	(96)
第二节 义理经世：湖湘理学群体救时的主要途径.....	(109)
第四章 湖湘理学群体的社会实践	(119)
第一节 湘军网络的形成与维系	(119)
第二节 重建社会秩序的理想与实践	(143)
第五章 秩序重建的成功与失败	(165)

2 目 录

第一节	“同治天下”——理想与权力的互动	(165)
第二节	文化政治视野下的晚清湖湘理学群体	(177)
参考文献		(188)
后 记		(197)

绪 论

本书以晚清湖湘理学群体为研究对象。具体而言，主要研究清咸同（1851—1874）年间的湖湘理学群体，对嘉道（1796—1850）、光绪（1875—1908）时期的湖湘理学群体并不予以详细考察。这主要是考虑到，晚清湖湘理学群体起于嘉道，盛于咸同，到光绪年间已经衰颓。而且，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咸同年间也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在此期间，太平天国运动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交织，内忧与外患的叠合，中央与地方同治天下局面的形成，旨在“求强”、“求富”的自强运动的发轫，凡此种种，都绕不开湖湘理学群体。可以说，“同治中兴”离不开理学复兴，理学复兴离不开这一时期湖湘理学群体的努力。因此，清咸同年间的湖湘理学群体更具有研究上的典型意义与价值。

程朱理学作为元明以来的官方哲学，在清代已经呈现出种种衰落迹象。清初，在康熙帝的大力提倡下，程朱理学也仍然居于学界的统治地位。然而，自乾嘉汉学兴起之后，清代学风发生转变。许多士人往往只是为了通过科举考试才诵读程朱的著述，一旦考中，就将它们束之高阁，转而研习汉学诗赋，以博取在学界的声名。程朱理学受到多数士人的厌弃，被长期冷落。直至道咸以后，清王朝鉴于政治上和学术上出现的双重危机形势，把挽回危机的希望寄托于程朱理学的重振，各地的理学士人也逐渐活跃起来，纷纷举起振兴程朱理学的旗帜，终于在同治年间酿成了一个短暂的理学复兴局面。

1862年（清同治元年），曾任顺天府尹的蒋琦龄上“中兴十二策”，力倡崇理学以兴教化。他认为乾嘉汉学是“世教衰微，人才匮乏”的罪魁祸首，所以“欲正人心，厚风俗，以开太平，非崇正学以兴教化不能也。”因此极力主张效仿康熙帝“退孔郑而进程朱，贱考据而崇理学”^①。蒋氏的上疏得到了清廷的肯定，并随即颁谕天下：

各直省学政等躬司牖迪，凡校阅试艺，固宜恪遵功令，悉以程朱讲义为宗，尤应将《性理》诸书，随时阐扬，使躬列胶庠者，咸知探濂洛关闽之渊源，以格致诚正为本务，身体力行，务求实践，不徒以空语灵明，流为伪学。^②

与此相适应，清王朝先后提拔了一批以理学相标榜的大臣担任要职。为清王朝撑起半壁江山，但在咸丰朝始终不获实权，仅署理两江总督的曾国藩除了被实授两江总督外，还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官员均受节制。终咸丰朝一直未获大用的倭仁也在同治改元后时来运转，先是擢工部尚书，随后又被派充同治幼帝的师傅，掌管翰林院，授协办大学士，接着又管理户部，授文渊阁大学士，一跃而成为清王朝的最高理论权威。吴廷栋被授予大理寺卿、刑部侍郎等职。李棠阶也被任命为左都御史，入军机处，参与机要。经过这一番人事变动，清廷中理学大臣的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在他们的积极倡导和有力推动下，理学在同治朝终获复兴。概括地说，他们为了推动理学复兴所作的努力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

^① 蒋琦龄：《中兴十二策疏》，见王云五编：《道咸同光四朝奏议》第四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第1433页。

^② 《清穆宗实录》卷二十二，同治元年三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09页。

方面：

第一，正君心。

正君心也就是要求君主按照正学的要求修身养性，时刻保持戒慎恐惧之心。在理学士人看来，这是为政的根本宗旨。因此，倭仁出任同治帝师后立即将他以前辑录的古帝王事迹及古今臣工奏议《帝王盛轨》与《辅弼嘉谟》进呈给朝廷，作为“启沃圣心”的教材。对此，清廷嘉许，立即颁发上谕，表彰该书“洵足资启沃而绍心源，著赐名《启心金鉴》，并将此书陈设弘德殿，以资讲肄。”^①

李棠阶被起用后也上《条陈时政之要疏》，提出振兴王朝最重要的就在于“端出治之本”，他认为“夫出治在君，而所以出治者在人君之一心。今海内沸腾，生民涂炭，诚刻苦奋励之时也。臣谓刻苦奋励之实，不徒在于用人行政，而在于治心；治心之要，不徒在于言语动作，而尤在于克己。”^②强调用程朱理学的格物诚正之说，培养圣心君德，以振纪纲。

吴廷栋也同样重视正君心的问题。1864年（清同治三年）湘军攻陷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后，朝野上下人人兴奋不已，只有吴廷栋本着居安思危的态度，上了一道《金陵克复请加敬惧疏》。吴廷栋认为：“从古功成志遂，人主喜心一生，而骄心已伏”，其结果必然“受蛊惑，塞聪明，恶忠说，远老成”。因此帝王应该时刻保持敬惧之心。此疏上达后，也得到清廷的赞许：“兹览吴廷栋奏于万方之治乱，百官之敬肆，皆推本于君心之喜惧，剴切敷陈，深得杜渐防微之意。”^③并将此疏存于弘德殿以备省览。值得一提的是，吴廷栋的奏疏不仅受到统治者的嘉奖，

① 《清穆宗实录》卷十九，同治元年二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15页。

② 李棠阶：《条陈时政之要疏》，《李文清公遗书》卷一，清光绪八年（1882）河北道署刊本，第1页。

③ 《十朝圣训·穆宗毅皇帝圣训》卷二，“圣德”，清光绪年间石印本，第1页。

在未仕的士人阶层也颇为流行，“一时传抄疏稿，几于纸贵。”^①

上述理学大臣所提出的正君心以端国本的建议，不过是理学家的老生常谈。在咸丰朝他们也多次以此进谏，但往往被视作迂腐。而在同治朝由于恰好适应了此时期清廷加强思想统制的需要，因而得到清廷的支持，程朱理学也因此借助政治势力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第二，正学术。

所谓正学术，即是指以程朱理学为天下唯一的正学，对此要大力提倡，而一切不符合程朱理学的学说包括汉学、陆王心学等都要加以批判。李棠阶在《军机说帖》中就明确提出了这一主张。他认为：天下败坏由于士习不端，士习不端由于学术不正，“故为治必先得人，欲得人必先造士，欲造士必先正学术。”^②

因此，这些理学士人都极力鼓吹程朱理学。吴廷栋就到处宣扬程朱理学，他说：“程朱以明德为体，新民为用，乃由体达用之学。”^③ 倭仁也以提倡程朱理学为职志，他声称：“程朱论格致之义，至精且备，学者不患无蹊径可寻，何必另立新说滋后人之惑耶！”^④

在提倡“正学”的同时，他们还竭力反对所谓的“俗学”和“异学”。所谓“俗学”，在理学士人那里指的是考据之学和词章之学，而“异学”就是王阳明心学、释老之学及一切不符合程朱理学的学说。其中，他们最反对的就是王阳明心学。为了辨明道统，倭仁和吴廷栋整理校刊了河南儒生刘廷诏的《理学宗传辨正》。《理学宗传辨正》为纠正清初理学家孙奇逢的《理

① 方濬师：《蕉轩随录续录》，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75页。

② 李棠阶：《军机说帖》，《李文清公遗书》卷二，第26—27页。

③ 吴廷栋：《召见恭记》，《拙修集》卷一，清同治十年（1871）六安求我斋刊本，第4页。

④ 倭仁：《答窦兰泉》，《倭文端公遗书》卷八，清光绪元年（1875）六安求我斋刊本，第18页。

学宗传》而作。在《理学宗传》中，孙奇逢建立了一个自周子以下平列程、朱、陆、王 11 子为“正宗”的儒学道统体系，他甚至说：“接周子之统者非姚江其谁与归？”^①这当然是程朱理学之士所不能接受的。于是道咸之际刘廷诏特别著《理学宗传辨正》与之辩驳。《理学宗传辨正》把孔孟及宋五子列为“圣学”的代表和传人，而把陆王之学视为“异端”，从“圣学”系统中予以排除。因此得到倭仁的赞许，称该书“统绪分明，厘然不紊，可谓趋向端而取舍审矣”^②，并嘱托吴廷栋加以校订，此书才得以在同治年间问世。

对于雄霸清代学坛百年之久的考据学，部分理学士人也颇有微词。如方宗诚就指责汉学家“每逞偏见一得，别立宗旨，或尊古本，或改朱注，或专重致知，或专主诚意……皆务新奇而诋程朱”，终于导致了社会的动乱。因此，只有以“正学”反对“邪说”，才能永保太平。

总的说来，在这些理学士人眼中，要正学术就必须“明正学”和“辟邪说”。其中，最重要的是“明正学”。“明正学”与“辟邪说”虽然都是为了正学术，但“明正学”却是“辟邪说”的根本，正如方宗诚所指出的：“果自上至下，能确守《大学》之道，程朱之教，身体力行，期于明体而达用焉，仕则施诸士，舍则垂诸书。正学一明，邪说未有不渐弥者也；正道既尊，邪教未有不渐息者也。盖在我者先有拨乱反治之具，而后可成除暴救民之功，不然终肤末耳。”^③

① 孙奇逢：《理学宗传·叙》，清光绪六年（1880）浙江书局刻本。

② 倭仁：《校订理学宗传辨正叙》，见刘廷诏《理学宗传辨正》，清同治十一年（1872）六安求我斋刊本。

③ 方宗诚：《大学臆说序》，见苏源生《大学臆说》，清咸丰十一年（1861）明德堂藏版，第1—2页。

第三，正教育。

作为科举功令，程朱理学在教育领域本就颇具影响。在同治朝，这些理学大臣又进一步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和渗透。同治皇帝冲龄即位，帝师的选择是一个重要问题，它表明了最高统治者对学术的态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术的未来走向。对于此事，这些理学士大夫极为关注，并上下奔走，努力把这一要职抢到手。为此，吴廷栋特致信曾国藩，请他力保倭仁。信中称：“现在根本之计，孰有师傅所关之重，新政首务亦孰有急于此者？今幸见及，自宜以此专责之良峰矣。再三迟回，正不得不虑及日久变生，致生他议。某位卑分微，无能为役。窃念能同此心者，唯阁下一人而已。即今想已得尽读邸报，时势亦已了然于胸中，乞特上一疏，专保良峰以固根本，万不可放过此关。”^①最后，清廷经过反复权衡，相继任命倭仁、翁心存、祁雋藻、李鸿藻等担任同治帝师，其中倭仁、李鸿藻都是当时知名的理学家。这给理学家参与朝政，推广程朱理学提供了有利的机会。

倭仁等理学家担任帝师后，都用程朱理学辅导幼主修身之方、治国之道。如倭仁奏称：“致治之理，莫备于经。若取《四书》、《五经》中切要之言，俾讲官衍为讲义，敷陈推阐，与史鑑互相发明，则裨益圣德，尤非浅鲜。”^②在以程朱理学教育皇帝的同时，担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的倭仁也以此教育翰林院学士。他在《翰林院条规》中，把《四书》、《朱子语类》，《朱子大全》等理学读本，定为翰林院学士的必修读物，明确表明尊崇理学的原则。李棠阶也强调对翰林院学士加强理学教育，他说：“窃谓宜令教习庶吉士，课以实学，由身心以达于时务，即《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正轨也。以此为本，治经、治吏、治

^① 吴廷栋：《拙修集》卷九，第18页。

^② 倭仁：《请进日讲疏》，《倭文端公遗书》卷二，第8页。

事及濂洛关闽诸儒等书，次第参求，皆归于反己。”^①

与此同时，地方各类教育机构也纷纷仿效，增加理学教育的内容，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等新式学堂也不例外。如上海广方言馆课程十条中就规定：“四子为读经之阶梯，《小学近思录》又为读四子之阶梯。拟于课文之前一日，讲解《养正遗规》、《朱子小学》诸书，若有进境，则授以《近思录》及《朱子全书》、《性理精义》各篇，诸生听讲时壹志凝神，退而精心体认，笃实践履，庶于言行之际，敬肆之分，皆有所持循焉。”^②可以说，程朱理学在各类教育中得到了强化。

在科举考试中，对程朱理学的尊崇也得到了强化。同治六年（1867），福建道监察御史、倭仁的弟子游百川上奏，称士子求名太急，于《四书》、《五经》未能成诵，导致学无根底，“今欲改此锢习，莫若杜人侥幸之心，而引之专意读经”，“请旨飭下督学使臣，遍行晓谕，生童中如有能默诵五经，通晓经义者，准其赴该学报名注册，即于考古场中按名面试，试以数条，其能否成诵讲解，无难立辨。可取录者，即正场文字未甚优长，亦拔以示鼓励。其未经报考，止就正场文字取录者，亦于发落时，令其认习某经，各注名下，俟下届按册试之，勤奋者立予奖励，玩愒者加之创惩。”^③ 清廷对此项建议予以允准，通谕各直省照办。通过以下疆臣的奏折，我们可以看出清廷此项举措得到了实施。同治七年（1868），奉天府府丞兼学政任兆坚奏称，谨遵谕旨，晓谕生童，令能默诵五经，通晓经义者报名考试，结果八名中有一名文理通顺，拔入正取，作为生员，其余几名文理稍逊，列入

① 李棠阶：《军机说帖》，《李文清公遗书》卷二，第26—27页。

② 《同治九年三月初三日总办机器制造局冯、郑上督抚宪禀》，见朱有瓛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22页。

③ 游百川：《请崇尚经术疏》，见饶玉成《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五十七，清光绪壬午（1882）江右双峰书屋刊本，第37页。

备取，作为廪生，“仍谕生童等熟习经书以应下届考试。”^① 同治八年（1869），湖北学政张之洞在郧阳科试中，即按此谕，令考生事先报名认习一经，考试时把自己熟悉的经文默写出来。但他认为经文受格式所限，建议文童复试，将经文改作经解。^②

综上所述，以曾国藩、倭仁、李棠阶、吴廷栋等为代表的理学大臣，在同治年间被委以重任，担任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军政要职，为镇压太平天国、恢复封建文教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他们的活动，不仅扩大了程朱理学的影响，而且加强了清政府在教育、政治、军事、文化上的力量，为“同治中兴”的出现创造了重要的条件，而其中作用最为突出的就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理学群体。

目前，地域文化研究已经蔚然成一显学。不过，本书以“清咸同年间湖湘理学群体研究”为题，却并非简单追逐学术热点的结果。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罗泽南理学思想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发现罗泽南并非一个孤立的个案。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刘蓉、郭嵩焘等人，实际上是作为一个群体发挥作用的。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实践平生所信仰的理学基本价值，不是他们某一个人的个人理念，而是他们的群体立场。那么，这一群体是如何形成的？于此扩展开来，显然有一系列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究。

在我们通常的理解中，理学家主要致力于“内圣之学”，对实际政治似乎抱着一种可即可离的态度。一个完全相反的例证就是，清咸同年间的湖湘理学群体不但是文化主体，而且也是一定程度上的政治主体。他们在思想上虽然难以称得上推陈出新，但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文教类》，奉天府府丞兼学政任兆坚同治七年六月初四日片奏，同治朝，第5005卷，第55号。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文教类》，湖北学政张之洞同治八年二月十二日片奏，同治朝，第5003卷，第4号。

是他们在政治上却形成了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并且涌现出了许多对中国近代化进程有着重要影响的著名人物。通过政治实践，他们在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正如钱基博所评价的：“人限于湖南，而纵横九万里之纷纭，导演于若而人之手。其人为天下士，为事亦天下事。”^①因此，我们对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研究就绝不能局限在传统的理学谱系之内，仅仅做内在的梳理。湖湘理学群体之所以能够发展出这种以重建社会政治秩序为己任的心态，究竟有哪些深层的文化心理背景？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风格有何特色？在他们身上，学术、地域、权力三者之间的重叠交织关系又是如何体现的？他们与权力世界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的理想与观念落在现实世界以后究竟产生了哪些正面或负面的效应？这些都是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

长期以来，以源于西方的“哲学”观念为取舍标准，理学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很难进入哲学史家的视野。由于晚清理学在形上思维的部分未能做出特别的创新，更是被长期忽视。清咸同年间的湖湘理学群体虽然因为在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影响巨大而引起学界的重视，但是多从湘军集团的角度切入，从而使对他们的研究成为政治史、军事史方面的命题，而这样的研究对于理学观念与政治实践之间关系的探究往往并不深入。

具体来说，对于清咸同年间湖湘理学群体中的曾国藩^②、左

① 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04页。

② 熊吕茂：《近年来曾国藩研究综述》，《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王澧华：《似花还似非花——曾国藩文献与曾国藩研究》，《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4期。成晓军：《近十年来曾国藩洋务思想和洋务活动研究概述》，《江海学刊》1995年第5期。

宗棠^①、郭嵩焘^②等人，学界的论述颇丰，但是对胡林翼、罗泽南、刘蓉等人的研究尚少，比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王尔敏的《胡林翼之志节才略及其对于湘军之维系》^③，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罗氏学术大要》^④、《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罗罗山学述》^⑤，陆宝千的《论罗泽南的经世思想》^⑥、《刘蓉论——清代理学家经世之实例》^⑦等，关于王鑫、李续宾、杨昌濬等人则鲜有专论。从整体上论及这一群体^⑧的，从政治角度论述的有朱东安的《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⑨，从军事角度考察的有王尔敏的《湘军军系的形成及其维系》^⑩，从思想文化角度切入的有李国祁的《道咸同时期我国的经世致用思想》^⑪等，以及一些地方史著作如陶用舒的《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研究》^⑫等。

① 汪长柱：《全国左宗棠研究学术讨论会在长沙召开》，《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1986年第1期。刘泱泱：《左宗棠研究述评》，《求索》1986年第2期。

② 王丽：《近五年来郭嵩焘外交思想研究概论》，《船山学刊》2006年第1期。黄林：《百余年来郭嵩焘研究之回顾》，《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2期。

③ 王尔敏：《胡林翼之志节才略及其对于湘军之维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7期，1978年6月。另外，关于胡林翼的研究成果，岑洪有一篇《近二十年胡林翼研究综述》（《贵州文史丛刊》2003年第3期）。

④ 钱穆：《罗氏学术大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⑤ 钱穆：《罗罗山学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8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0年。

⑥ 陆宝千：《论罗泽南的经世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15期下册，1986年12月。

⑦ 陆宝千：《刘蓉论——清代理学家经世之实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3期下册，1972年12月。

⑧ 对于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刘蓉、郭嵩焘等人，学界多把他们称作湘军集团、湘军人才群体或者曾国藩集团，鲜有称其为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事实上，却是先有晚清湖湘理学群体，后有湘军的，这一群体也并非以曾国藩为唯一领袖。

⑨ 朱东安：《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北京：华文出版社，2003年。

⑩ 王尔敏：《湘军军系的形成及其维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8期，1979年10月。

⑪ 李国祁：《道咸时期我国的经世致用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15期下册，1986年12月。

⑫ 陶用舒：《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从知识群体这一角度探讨近代湖湘群体的只有杨念群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①等少数著作。不过，杨著旨在分析三大知识群体的互动关系，并非近代湖湘理学群体的专论。

本书则把研究的重心集中在晚清湖湘理学群体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实际关联与交互作用上，以彰显当时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特点与结构。也就是说，将湖湘理学群体放置在当时的历史脉络中来观察它的动态，研究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与政治实践、社会情境的互动关系，而不是把他们每一个人物的思想材料分门别类予以罗列。因此可以算是文化史、政治史与社会史的综合研究。

陈寅恪在论述古代哲学史研究方法时曾经指出：“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②受此启发，笔者认为只有努力体会研究对象所面临的境遇，才会减少一些以今天的眼光想当然地臆测前人的错误。而要得出更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就必须尽可能全面地把握材料。为了更鲜活地呈现当时的社会情景，本研究报告广泛使用了时人的文集、诗集、书信、日记以及年

^① 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② 陈寅恪：《审查报告一》，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页。